

记着他的笑，他的泪光

——回忆舒乙馆长 □计蕾



舒乙

今年年初召开馆长办公会，有人感叹说：每次一走进文学馆的大门，看到院子里的这些作家雕像，大门把手上巴金先生的手印，都很有感触。我却在想，舒乙馆长为文学馆做了很多事，可是馆里却看不到他的一点痕迹，这不应该，我们应该记住从第一任老馆长杨犁到后来这些老馆长对文学馆的贡献，哪怕是挂一张照片呢，总教人们不能忘记他们。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常常就这样忽略了身边最近的人，可一旦认真回想起他们来，昔日的时光却变得格外清晰。

回想2021年4月20日那天的情形，我深深体悟了什么叫做命若琴弦。那天上午，于滨老师给我发来微信说：“舒乙病危！”我火速赶到医院，听大夫说请了协和医院的专家会诊，如果舒馆长能平安度过这两天，就能好几天。但能好几天？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因为疫情管理，病房不能进，想看一眼舒馆长都不可能，我们和于滨老师在医院外边找了个地方焦急地等待，希望能有转机，希望能有个人来说“别担心，会好的！”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4月21日下午两点16分，舒馆长走了。对于舒馆长的走，我理解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不忍他就那么躺着。他应该漂漂亮亮地活着，潇潇洒洒地活着，忙忙碌碌地活着，而不是躺在病床上，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那不是我们的舒馆长。

2015年9月7日上午，刚过完80岁生日不久的舒馆长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前一天他参加了一场电视节目的录制，可能是累了，等他病情平稳后我去医院看他，他安静无声地躺在病床上，再不复从前那样风度翩翩、谈笑风生。他不认识我了。我难过地握着他的手，多希望他还是原先那种开怀大笑、神采飞扬的样子。

舒馆长的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笑。

1989年我刚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第一次参加全馆大会，那时舒乙先生是常务副馆长，忘了当时会议的主题，却记得听舒馆长讲话，还以为是听了一场单口相声，逗得大伙儿笑成一团。他那地道的北京话，绘声绘色的表情，红润的脸膛，一笑起来鼓起两块可爱的苹果肌，任谁见了都会立刻被他打动、感染。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1998年，舒馆长把我从征集部调到展览部，参与筹备文学馆新馆的三个大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20世纪大师风采展》和《作家文库展》。对于新馆的展览，舒馆长抱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多的设想，他希望我们能把展览做成精品，做到“创意独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效果显著”。这可不容易。

当时展览部加上我统共就三个人，两个文案，唐文一老师和我，一个美工，沐定胜去老师。我们仨天天加班加到晚上10点多。所有的资料要去查找、核实，展览方案一遍又一遍地改；与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不停地沟通，头脑风暴，出新方案。辛苦是辛苦，但大家都感觉很充实。对我来说，那一年还多一些的时间仿佛是浓缩的橙汁，又酸又甜，每天都很饱和，工作量饱和，学到的东西饱和。按照唐文一老师的话说，我们是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的，觉得特别有意义。

这里是一片美丽的家园，令人心驰神往。这里是一方神奇的秘境，让人如梦如幻。这里是一块丰富的乐土，使人目不暇接。美丽、神奇、丰富是徐迟老对云南的总结，是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基础和起源，人们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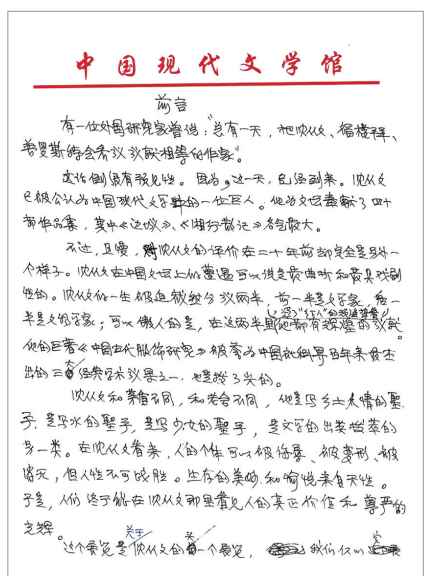
一个夜晚，当我们站在云岭高原，站在澜沧江和湄公河的连接处，身处热带雨林的寨子里，力图去还原李桓英当年在云南的漫漫行医轨迹。但能供我们感受的东西，都被岁月抹平……“琵琶鬼”们已随岁月远去，要不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原帮，村民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而昆明近郊的原昆明生物研究所，已是人去楼空，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马海德、顾方舟、汤飞凡、屠呦呦们，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2021年，在我国乃至全世界享有盛誉的麻风病学专家李桓英，在百岁华诞之年，荣获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为此我们决定为她立传，力图去还原李桓英当年在云南的漫漫行医轨迹。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麻风病几个字，触发了我们遥远的、笼统称为瘟疫的传染病记忆。不仅是麻风病，云南人的记忆中，流传的故事跟传染病相关的非常多，特别是西南边陲，更是长期深受传染病的荼毒。最令人谈之色变的，当属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云南思茅（现普洱思茅区）在疟疾肆虐下，从1919年开始的30年间，从常住人口7万余人的繁华边贸小城，到1949年思茅解放时，坝区人口已不足2000人。

这仅仅是疟疾。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疫病在云南肆虐，除了鼠疫、疟疾、霍乱以外，还有天花、麻风、麻疹等多种烈性传染病，使无数无辜百姓过早地失去生命。

遗憾的是，亲历这些疫病蔓延恐慌的人们已经所剩无几，各种传染病的危害成为被淹没的历史，导致公众对我国传染病的了解近乎空白。因此我们不能只知道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还应记住更多的传染病专家。是他们携手筑起了卫生防疫的屏障，将各类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言手稿

二〇〇一年舒乙为《沈从文生平与创作展》的前言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

有一位外国朋友曾问我，总有一大堆人，像舒乙、舒庆春、希冀斯、希冀斯、希冀斯……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舒乙说，舒乙从他的评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从他的那些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爱……

加班的时候，舒馆长时不时地到展览部来看望我们，询问进度，有没有困难，需要我们配合做什么，或者请我们出去吃晚饭，和我们闲聊一通，打打岔，让我们放松休息一下。我们常去的是老文学馆附近的老北京家常菜小饭馆，舒馆长对吃饭不讲究，好的孬的都行，吃饭还特别快，别人刚吃一半他都吃完了，然后给我们讲故事。

舒馆长肚子里的故事那叫一个多，听他讲一天也不带重样的。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文坛掌故，他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自己讲得明显比较夸张，令人起疑，但却生动无比。他讲完了自己哈哈大笑，那笑声像一群小鸟似的，从他心里啦啦啦啦地飞出去了。

他讲老北京的吃食，豆汁儿，炸咯吱盒儿，讲他母亲胡絮青做的芥末墩儿。他就聊这个，我这个皖南人后来能够接受炸焦圈就豆汁儿，也能吃蘸鼻子的芥末墩儿了。后来舒馆长特意请我们去北海公园吃仿膳，犒劳我们。他退休后，金秋时节还请我们展览部的人到他家吃螃蟹、喝黄酒，其乐融融。

和舒馆长在一起，没有让人顾虑的上下级禁忌，很自在，有什么意见想法直截了当地提。那时，我也提了很多不靠谱的意见，舒馆长并不以为作。他把自己的创作设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从新馆大堂的壁画、玻璃镶嵌画，到文学馆的LOGO设计方案。他常常把几种设计图样拿到展览部让我们看，让我们选，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选的和他不样，他也不生气，就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来。为了新馆开放，他除了完成三个大展的设计制作，还做了门票、纪念封等各种文创，每周我们都和舒馆长开会或者一起出去看样品。大家同心协力完成一件大事的感觉，特别愉快。

2001年夏天，我们完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展》获得了国家文物局主办评选的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品奖”，舒馆长带着我去杭州参会领奖。第一次跟舒馆长出差，心里乐开了花，可也吃了意想不到的苦头。当天我们领完奖就没事了，舒馆长也比较放松，住地正好在西湖边上，他说出去转转，我便跟着他去了西湖。可是没承想，刚到花港观鱼，就有认识舒馆长的游客过来攀谈。舒馆长是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令人瞩目的。他是个社会活动家，热心文化事业，经常上电视，出境率高，认识他的人非常多，不一会儿身边就围了一圈人。舒馆长一点儿不高冷，乐意和大家聊，一聊就刹不住。而我在一旁被西湖的蚊子团团围住，那花心大蚊子在我的胳膊上、腿上、脸上、手上亲了几十个大包，又大又硬，又疼又痒。最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拉着舒馆长赶紧走人。但还是不断地有人跟他打招呼，停下来说话，我真奇怪这蚊子怎么不咬舒馆长呢。第二天，我是带着金色的奖牌和二三十个红彤彤的蚊子包回北京的。

舒馆长吃饭快，走路更快。那时候还没有记步器，要是有，我估计那天在西湖边至少走了两万多步。我跟在舒馆长后边转了苏堤、白堤、断桥、西冷印社、丝绸博物馆，一路小跑般地追随着，他60多岁的人比我30来岁的人走得还快，要知

道他还有严重的脚趾外翻哪。他对文化古迹极有兴趣，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好像要用眼睛把这些都扫描进脑子里存着。文学馆新馆的艺术装饰，我想很多就是源于舒馆长长期的艺术积累。

2000年5月，文学馆新馆一期建成开放，舒馆长说我们要不断搞活动、办展览，宣传文学馆、宣传作家、宣传文学。他是个行动派，做事快，写东西也快。我们做的作家展览，前言都是舒馆长亲自写，写完了让我打印出来。一般情形是，我们布完展览，开展前舒馆长去展厅里看一遍，然后就着手写前言。大多是千字文，有那么一两夭就给我了，一遍稿，有些修改，不多。像他父亲老舍先生，他说老舍先生1949年前的稿子都是一遍稿，没有一篇二稿三稿那样子，包括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00万字的作品也是一遍写下来。后来舒馆长一家把《四世同堂》的手稿捐赠给文学馆，看原稿干干净净，文字是在心里斟酌好了才落笔。

舒馆长的字像老舍先生，文风也和老舍先生有点像，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爱用短句，喜欢口语，直截了当，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态度鲜明，不模棱两可，不含含糊糊，就像他的口头禅：“了不起！”“倍儿棒！”谈起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萧乾先生、林海音先生等老作家对文学馆的支持与贡献，他最爱用的就是这样的口头禅。

2013年4月，舒馆长和他的姐妹舒济、舒雨、舒立女士秉承父母遗志，将老舍、胡絮青夫妇珍藏的一批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黄宾虹等人的美术杰作无私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借用舒馆长自己的口头禅，真是“了不起！”“倍儿棒！”在捐赠仪式上，舒馆长说捐赠的目的是为了把这批国宝能够回归祖国，能够为广大观众共欣赏。当他说到老舍先生，眼里泛起了泪光。

40多年前，巴金先生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学类博物馆，藏品达80多万件。在这个过程中，舒馆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尤其是文学馆新馆的建设与发展，他呕心沥血，有许多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并付诸实施。他把文学馆设定为文学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还是展览中心、研究中心。为了让市民知道有文学馆这么个地方，他甚至找到北京市主管部门，把文学馆门前的马路由“安苑东路”改成了“文学馆路”，公交车站也改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站”。

舒馆长不单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扑在文学馆上，还发动了身边能发动的所有人，所有关系，连他的老伴儿于滨老师也拉到馆里帮忙干活。新馆建成，文学馆征集部人手不够，去唐弢先生家接收书刊，60多岁的于滨老师和大家一起整理登记，连书带刊加在一块4万多册哪！大家问于滨老师您打字怎么打得那么快？于滨老师说在家里舒乙的稿子都是她给打的，他不会用电脑，写得又勤快，所以舒馆长写一篇于滨老师打一篇，天长日久便练就了本领。单单就我们文学馆，舒馆长就写了两本书《现代文坛瑰宝》和《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于滨老师说，舒乙真的很勤奋。

舒馆长曾在年终总结中写道：“不断搞活动，发动一切宣传工具，频频在宣传媒体上亮相，通过写文章、讲演、讲解、请人参观等手段，宣传文学馆……达到五多：参观人多、听讲人多、新建文库多、重要文物人藏多、好评多。”他真的是把所有心血、精力和才智都倾注在文学馆上，他真的愿意为文学馆干一辈子。

舒馆长文章里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这就是生命，或，生命就是如此。在他走之前，把想做的事，要做的事尽情地做，快快乐乐地做。办文学馆、写文章、讲演、画画、参与社会活动，发挥出他全部的光亮。

舒馆长虽然走了，他那丰富的表情、畅快的笑声、凝神思索的样子，他说过话、做过的事都还清晰地印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会认真记住他的。

一位医学专家的百年守望

——《大医百年》创作谈 □杨红昆 朱 镛

传染病阻拦、消灭，守护人类的健康。李桓英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位1946年便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的“大医”，甚至鲜为人知。

2020年以来，全球饱受新冠肺炎病毒侵袭，《大医百年》意图用丰富的资料、现场记录、大医精神的使用，不限于从一个维度认识传染病、流行病，而是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客观思考这一现象后面的深刻意义。

这种让人皮肤溃烂，针戳或刀割没有任何痛感，恐怖到令人不敢目睹的传染病，曾是人类的噩梦，在医疗条件缺失的时代，得病后的遭遇比乞丐和犯人还要凄惨。被赶走、独居、毫无自尊的自生自灭是麻风病人的生存常态。在云南，最典型的当数昭通天坑中的麻风村。这个天坑在镇雄县，名字叫大锅洞，是火山喷发遗留下来的大坑，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新中国成立以前和初期的麻风病人，从坑顶用绳子编织成的梯子放下去隔离。除了按时投放药品和粮食，基本与世隔绝。在边疆地区，则是被赶到聚集区，众多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形成人人避之不及的麻风村。

恐惧是有理由的，麻风病的潜伏期可以是几年，而且无形无色，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世隔绝。

为此，诗人张二棍在《天坑下》这样写：垂绳的人早已离开，绳子在吊过最后一个人之后，就开始了腐朽。只有麻风病人/留了下来。他们宛如/一个高僧，需要朝夕/面对着，这万仞悬崖/一遍遍，功课般/呼喊着一个亲人的名字/那此起彼伏的喊声，在天坑下久久回荡着/——让这些喊声多回荡一会儿吧/他们一直喊着，就会忘记了疼痛/他们一直喊着，就不会绝望。

2021年，李桓英率先用两年时间实施“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曼南麻风病，进行我国首例现场防治试点，经两年的努力和十年的监测，短程联合化

疗取得完全成功，1985年在云、贵、川三省全面推广，得到WHO的认可，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各国推广。李桓英连续十几年亲自深入麻风地区，对接受治疗的病人进行观察研究，极力支持对麻风病人应该开放、实行院外规则治疗，在治疗中可以正常就业、就业，使患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来的20年时间，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多次请国际专家授课，为基层培养了大批麻风病防治骨干。她地为云、贵、川地区申请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项目治愈的麻风病患者达10000多人，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1%）。1999年，中国98.6%的县（市）消灭麻风病，短程联合化疗取得功，李桓英为麻风病防治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取得了世界水平的成果。

李桓英没有辜负前人的心血，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她首次提出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防治行动”，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名义，在全世界范围推广。

正如中国疾控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所说：“李桓英同志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她对党忠诚、热爱祖国，始终心系人民健康福祉，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卫生健康事业；她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她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鲜明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今天，每当听到山东援鄂护士张静静的女儿撕心裂肺的呼喊：“妈妈你不要离开我，我喜欢你！”我们便泪流满面！

张静静生前留给我们的遗言便是“愿以吾辈的青春，守护这盛世的中华”。这是几代医护工作者的铮铮誓言。

舒馆长文章里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这就是生命，或，生命就是如此。在他走之前，把想做的事，要做的事尽情地做，快快乐乐地做。办文学馆、写文章、讲演、画画、参与社会活动，发挥出他全部的光亮。

舒馆长虽然走了，他那丰富的表情、畅快的笑声、凝神思索的样子，他说过话、做过的事都还清晰地印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会认真记住他的。

舒馆长虽然走了，他那丰富的表情、畅快的笑声、凝神思索的样子，他说过话、做过的事都还清晰地印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会认真记住他的。



林建法

在夏花芬芳，小满初绽的季节里，我们送别了敬爱的师长。《当代作家评论》原主编林建法先生。眼含热泪，抚今追昔，一个宽阔而深邃的灵魂离开，让我们感慨慨猝不及防中的世事无常，更让我们叹息生命之丰满沉实与仓然流逝。

林建法先生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文学事业，做一名编辑家的楷模。用他自己的话说：“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个孩子”，“作家、批评家写文章是创作，编辑刊物同样是创造性劳动，他的作品是刊物，一本好的文学刊物对时代的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是终生想当编辑的，而且想做中国最好的编辑。”

林建法先生生于1950年，1970年入伍，1976年到西藏插队。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任《福建文学》理论编辑，1983年提议创办《港台文学选刊》，1984年调到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参与创办《30年代文艺探索》，任编辑。1986年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任《当代作家评论》编辑，1987年任副主编，2000年任主编，2007年任创作研究部主任。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在3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林建法先生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惊人的毅力、勤奋扎实的态度表现出一名专业期刊人的职业操守和人格魅力。他将办刊事业融入自己的全部生命中，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在清贫的环境中固守着文学绚丽的精神家园。他带领《当代作家评论》在艰难中执着前行，令其焕发勃勃生机，彰显独特个性与价值，跻身全国文学评论名刊行列，可以说他功不可没。他编辑过7本刊物，主编图书超过100种，策划参与的文学活动不下300余场。在其主持《当代作家评论》编辑工作期间，刊物多次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多次被评为辽宁省一级期刊、东北三省优秀社科期刊，200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4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GFD）全文收录期刊。2004年起连续三次被评为中国北方优秀期刊。

林建法先生令人敬佩和尊敬之处还在于，他把编辑工作拓展为创造性的文学实践活动。他始终行走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最前沿，同时以一己之力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纯净而开放、特色鲜明而又丰富活泼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批评与创作的交流与交锋，批评家和作家的成长与成才，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现场极为生动的场景，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30余年的编辑生涯，也因此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的研究视野几乎涵盖了当代中国文坛重要作家作品，通过开设“小说家讲坛”等栏目、组织优秀作品、开展文学活动、“中国当代优秀批评家”奖的评选等形式对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与潮流发展给予了及时关注与研究，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队伍，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他特别注重对青年批评力量的培养，一直通过筛选来稿发现新人，为全国在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还有一些批评家在本科时的处女作就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不管是谁，也不管有没有关系，只要看准这个人，他是始终追踪的，努力给批评家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机会，让人与刊物一同成长。

他多次策划重大文学学术活动，如“2001长篇小说文体研讨会”“小说家讲坛”“2003新世纪汉语写作走向学术研讨会”“2005小说现状与可能性对话会”“贾平凹作品学术研究会”“中国首届文学传媒与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莫言作品学术研讨会”“王安忆作品学术研讨会”“华语文学与世界文学高峰论坛”“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第三届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等。

林建法先生一直秉持着“坚持文学品格，恪守学术立场”的办刊宗旨，坚持文学立场，开拓办刊思路，严把稿件质量关，注重推陈出新，不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角度里，而是参与整个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力求将思潮、探索、评论综合在一起，这样刊物才会生机盎然。

他认为，无论人事、语境有了怎样的变化，文学、文学批评以及此为中心的批评杂志，其意义就在于超越现实的困扰，坚持文学的理想，严格批评的尺度，坚守敬畏文学的立场。这几个方面把持住了，杂志就不会随波逐流。可以说，正是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危机中，在探索文学潮流的新变中，《当代作家评论》完成了历史转型，既传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想，又更多地呈现了新时代的新风貌，而他个人的办刊风格也逐渐成熟，他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得到彰显。他始终认为当一个好的编辑，就希望所有好的评论文章都由自己刊物发出去，我们不但要发现好的作品和好的批评家，还希望能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话题和新的命题，对整个文学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个好的编辑必备的东西，就是必须对整个文学运动有一个全局性的视野和前瞻性的眼光，能够从文学最初的发端和最初的现象中看到文学发展的脉络，这是很重要的。

鉴于在编辑工作中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获辽宁省十佳编辑、东北三省优秀社科编辑、第四届辽宁文学奖、首届“辽宁省期刊人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第二届“春申原创文学奖”文学编辑成就奖等20多个称号、荣誉和奖项。

林建法先生斯人已逝，音容笑貌却犹在眼前。他开创的文学编辑事业和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作为文学编辑，我们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专业独到的目光、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将这份塑造人类灵魂的事业发扬光大，完成他未竟的心愿。

林建法先生，走好！

送林建法先生远行

□韩春燕

林建法先生斯人已逝，音容笑貌却犹在眼前。他开创的文学编辑事业和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作为文学编辑，我们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专业独到的目光、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将这份塑造人类灵魂的事业发扬光大，完成他未竟的心愿。

林建法先生，走好！